

行云流水記

下

沈鵬年 著



上海三聯書店

沈鹏年 著

行云流水记狂

下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云流水记往 / 沈鹏年 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3

ISBN 978—7—5426—3024—7

I. 行… II. 沈… III. 沈鹏年—回忆录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7012 号

行云流水记往 (上、下)

著 者/ 沈鹏年

责任编辑/ 冯 征

责任校对/ 张大伟

责任制作/ 李 敏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 — 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苏州吴中区文化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7.5

印 数/ 1—3300

ISBN 978—7—5426—3024—7

I · 421

定价 35.00 元

探

源

篇

文以载道 秀出天南

——悼文史大家金性尧先生

蛰居太湖，远离申江，讯息不免闭塞。在 2007 年 8 月 1 日《中华读书报》拜读了孙仲先生《金性尧病逝，为何媒体反应冷淡》一文，惊悉高龄 91 岁的性尧先生已“于 7 月 15 日因病去世”。我无法回上海和金老“告别”，感到绵绵的惆怅。

性尧生前曾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第二编辑室副主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单位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专家学者发表情文并茂的悼念文章；家乡定海为表彰他对文化事业的贡献而建立“金性尧纪念室”。……他一生“秀出天南笔一支，为人风骨称其诗。”著作等身，尤以晚年的一本《新注唐诗三百首》纸贵洛阳，畅销三百万册，誉满海内外。实至名归，身后并不寂寞。

我与性尧先生的文字因缘，始于“孤岛”上海，“人生何所促，忽如朝露凝。”不觉已七十余年。

他早年《边鼓》战上海，《横眉》斥敌伪，以“文载道”笔名蜚声海上文坛。他的《新文艺书话》、《期刊过眼录》和著名的“星屋藏书”，为我从事“鲁迅研究”提供了方便。

1957 年，当拙著《鲁迅研究资料编目》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打出清样、即将出版面世时，他将鲁迅先生写给他的四封亲笔信赠给我。学术天下公器，鲁迅珍迹岂敢自秘，我特地函告许广平先生，由许先生编入 1959 年北京鲁迅博物馆印行的《鲁迅手迹和藏

书目录》第一集。为求永久性保存，我在1964年无偿转赠上海鲁迅纪念馆（当时由姚庆雄、浦勤修两同志经手收下），现编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上海鲁迅纪念馆藏文物珍品集》第28页。1958年左右，性尧见我对待文物资料热爱秉公，磊落无私，颇为嘉许。便把1939年他倡议并在中共地下党支持下编辑《鲁迅风》的全部文字档案材料，赠给我供进一步研究。这些材料包括《鲁迅风》前后十九期的校样外，更有许广平、周建人、陈望道、郑振铎、王任叔、孔另境、王统照、魏金枝、柯灵、唐弢、周木斋、石灵、巴金、李健吾、阿英、何家槐、周钢鸣、蒯斯曛、列车（陆象贤）、金祖同、卫聚贤、赵景深、谢六逸、周黎庵、陶亢德、徐訏、周楞伽、邱韵铎、钱今昔、吴调公、朱雯、罗洪、黄嘉音、旅岡、白曙、海岑、陈灵犀、陆小洛、胡山源等给性尧的亲笔信二百六十多件。当时曾经上海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叶以群先生和柯灵先生过目，他们要我考证、研究后写出相应的学术论文。上海《学术月刊》编辑黄迎暑同志专程来舍间商议发表问题。唐弢获悉后向我借阅这批材料。我在树民中学求学时，唐弢是树民中学的国文教员，碍于“师生情面”，我略作摘记后把这些材料全部借给了唐弢。

后来《学术月刊》催稿甚殷，我便向唐弢索讨。他一再推诿，只还回半数左右……

1959年党内发动“反右倾”运动，由于王任叔在1956年写过一篇《论人情》，文艺界便把他作为宣扬“人道主义”、“人性论”的“修正主义”典型开展批判。姚文元以巴人为靶子，在上海发表长文《批判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强词夺理、无限上纲，给巴人以致命的攻击。同年9月，唐弢调往北京，我去送行，留我便餐。临别时他对我说：“巴人那些信帮你处理了，否则，你如据以写文章吹捧他在《鲁迅风》的功绩，要犯大错误了……”当时，我还对他表示感谢。后来柯庆施提出只准写“十三年”，“左”风

凛冽，我就把自己长期收集的“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有关图书和材料转移到家乡洞庭东山老屋深藏密锁起来。家慈病故，长女育群回乡插队，为我守护这批深藏的材料。因此，躲过了“文革”浩劫，转移至家乡的图书和资料，幸得无恙。

龚定庵诗“文字缘同骨肉深”，我铭记性尧的深情厚谊，首先是他赠我的这批书信。“补记交情为纪公，厚重虚怀见古风。”我是永难忘怀的。他在“文革”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家破人亡，惨不忍闻。我去他北京路葆壬里老家的“斗室”中拜望他，他双耳失聪，靠了笔述，已经无从畅谈往事了。欣逢盛世，将我长期保存的残简公之于众。惜当年曾窥全豹的以群、柯灵两位前辈墓木已拱，然即此丛残亦弥足珍贵，《鲁迅风》里看性尧，足以见他“厚重虚怀”的“古风”于万一。他在《古今》创刊近一年后是奉袁殊之命投稿的。性尧在1946年曾对我说：“袁殊是三十年代左翼作家。是阿英介绍相识的。上海沦陷后，袁殊主动找到性尧。性尧猜测，他可能姓‘共’，也可能姓‘国’。无论如何，袁殊在政治背景上总要比周黎庵‘吃香’。所以，袁殊一‘开口’，性尧就应允了。现在（1946年）国民党以‘汉奸’罪名通缉袁殊，袁殊去了苏北共产党的地区，我原来对他‘将信将疑’，现在确信他姓‘共’无疑了。为了取得朱朴的信任，只能在文章中捧捧朱朴……”性尧除了向朱朴“投名状”的两文外，其他都是谈风土、谈掌故、谈人情、怀旧友……

1945年10月，连别有用心者在《文化汉奸罪恶史》中，也不得不承认：“几年以来，文载道虽未喊过什么‘大东亚’与‘和平’，可是对周作人却异常崇拜”，“他并没有大红而特红，也没有做官，只拿到细微的稿费，在‘太平书局’出版了一本文集《风土小记》。”（见该小册子第33～34页）——由此可知，这是有人唆使门人对金性尧的“恶搞”（kuso）。可是，从此却成为性尧的“白璧之玷”。但他既未参加伪组织，更无涉笔“大东亚”……，

当年连国民党政府在“惩治汉奸”时因抓不到他的把柄，未动他的毫发。建国以后，组织上实事求是地对待他的这段历史。追悼会上，组织上在《悼词》中肯定了性尧的一生。如今，建设“和谐”社会之际，在性尧逝世以后，个别人不顾性尧与桂芳夫妻情笃、白头偕老的事实，捏造谣言，无中生有，污辱亡者夫妇为此而“离婚”云云……此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死者已焉，生者何堪？古人云“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个别人的“恶搞”（kuso）是无损于性尧的日月之明的。我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有责任提供事实真相，以见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作为对亡友逝世“周年祭”的一瓣心香。

《鲁迅风》里看性尧

——在王任叔、王统照、巴金、李健吾等
致性尧 60 封信中反映的历史真相

《鲁迅风》是上海“孤岛”时期的重要刊物之一。它的创刊动机和宗旨，巴人在 1957 年写的《〈鲁迅风〉话旧》、金性尧在 1984 年写的《〈鲁迅风〉掇忆》两文中均有所叙述。但是，这两位当事人都比较谦逊，谈得非常含蓄。特别是性尧有功不居，受了委屈误解也不作丝毫辩解……



第一部份：王任叔幕后决策 金性尧认真执行 ——《鲁迅风》是党领导的文艺界统战工作的一部分

巴人说：“……座谈完了。但对鲁迅风杂文的抨击，并未完了。自《华美晨报》副刊《镀金城》的编者吴汉以至杨晋豪和叫做什么曾迭的，都进行过对鲁迅风（杂文）的‘围剿’，最后，在《中美日报》的《集纳》上，登了一篇张若谷的《写文学随笔》的文章，直接骂到鲁迅先生头上，……就在这种气氛前后，大概也是文载道的提议吧，索性来出一个《鲁迅风》的刊物。刊物之定名为《鲁迅风》无非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牛脾气：你讨厌它，我偏让它活道给你瞧。这样，《鲁迅风》就在1939年1月11日出版了。但在那刊物上，我不过有时也写些文章，打一个杂，一切编辑、出版事宜，我都不知道。按身份，不过是个投稿者罢了。”（见北京出版社1957年出版《遵命集》第148页。）

事实上，巴人即王任叔，当时是地下党的“文委委员”，文委书记是孙冶方，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沙文汉直接领导。其身份是幕后决策人。

一、蒋天佐证实：这是党领导文艺界的统战工作

据党员作家蒋天佐说：“大约是1938年吧，当上海‘孤岛’广大抗日爱国的革命文化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之际，组织上叫我到文艺界帮助王任叔等同志做一点组织工作。”“任叔同志比我年长，他是二十年代早期的革命风云中成长起来的一位斗士，……我只知道他是一位大革命时代的老党员和一位知名作家。”“任叔同志那时的突出贡献决不仅是他的大量写作和编辑工作。他是一座真正的桥梁，接通了一些五四时期的老作家们如陈望道、胡愈之、郑振铎、叶圣陶等先生同三十年代形成的左翼运动的联系，亲密地团结起来一致对敌。这一点，确实是当时工作得以蓬勃发展的

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重大胜利。”“其实，以《鲁迅风》为中心的许多辛勤的工作，也是任叔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文艺界统战工作。”（见1982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蒋天佐悼念王任叔《一篇不合规格的祭文》）

由此可知，地下党“文委委员”王任叔接受金性尧提议而决定创刊《鲁迅风》，以此为中心的许多辛勤工作，正是贯彻党在上海文艺界开展统战工作的组成部分。

二、王任叔致金性尧的“工作分工”信

这一点，从我手头还保存着当年王任叔致金性尧的亲笔信，可资证明。原信如下：

性尧兄：

印刷费已提出二百元，现在分工如下：

唐弢^[1]、文载道 编辑 陈明^[2] 印刷发行

发行人 请问 来复^[3]

一切请与陈明接洽。

晚上请去貂蝉^[4]一趟。

任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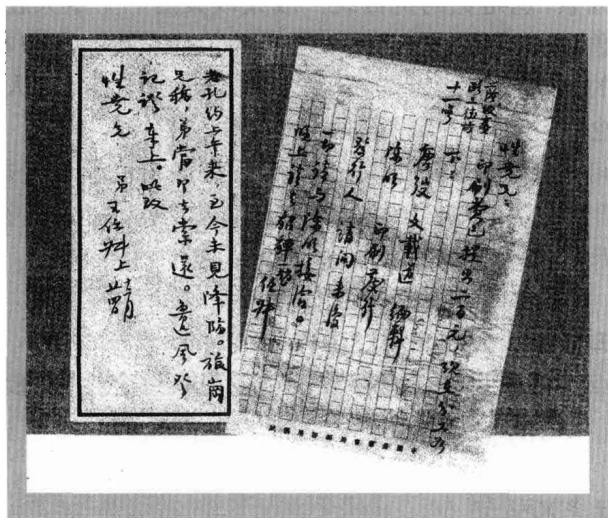
萨坡赛路三德坊十一号

^[1] 唐弢当时因故未能膺命，详见下文。

^[2] 陈明即“复社”党小组负责人。

^[3] 来复即来小雍。

^[4] 貂蝉是来小雍开设的“貂蝉食品公司”，在法租界马浪路霞飞路口，即今马当路淮海路口。全天供应茶点，午晚供应菜肴。附设茶室，也有包房。《鲁迅风》成员开碰头会商讨工作，有时就假座貂蝉的茶室。



三、王任叔原定唐弢为《鲁迅风》第一编辑，唐未膺命

《唐弢文集》第九卷《唐弢著作及学术、社会活动年表》称：“1939年唐弢26岁。1月11日‘鲁迅风’杂文作家的同人刊物《鲁迅风》创刊，唐弢是该刊的骨干。”（见该书第700页）

唐弢作为“《鲁迅风》骨干”是不假，事实上，对“编辑”的分工，当时唐弢未能膺命。内情如下：

当唐弢接到性尧转达王任叔的“分工”通知后，立即致信性尧，说明自己在“上海邮局”工作，每天上班，妻子王嫩重病在家，下班后需要照料，无法接受“编辑”之职。

性尧告诉唐弢：这是任叔“交办”的任务，请勿推诿。唐弢复信称：家累繁重，除病妻外，三个孩子中有两个亦病在家中。文章可以争取供给刊物，编务万万不能承担，请见谅。

性尧希望唐弢不要拒绝“编辑”的名义，具体工作由性尧承乏，只要他每星期来一次，发稿前审阅一下，提提意见可也。唐弢复信称：老兄家庭条件好，经济优渥，不愁衣食，无须为生活

奔波。还说在万分窘迫中草就《鲁迅的杂文》二千余字，聊以塞责。每期审稿之议无法应命，请多多原谅（性尧立即将《鲁迅的杂文》编入《鲁迅风》创刊号）。

性尧将情况告诉任叔，任叔对性尧说：那你就勉为其难，（编务）一人挑起来吧。——性尧把预定元旦出版、因唐弢而脱期十天的《鲁迅风》创刊号发排以后，带了相当数目的一笔款子同妻子武桂芳一起去探望病中的唐夫人王嫩。过了两天，性尧收到唐弢来信，感谢他们“贤伉俪”的“雪中送炭”，自己不在家而“失迎为歉”……（唐弢亲笔信被他借去后扣留未还，现从我在当时摘录的笔记中抄出，略见端倪）。

1939年5月26日唐弢写《心上的暗影》，发表于《鲁迅风》第十五期，文中说：“由于继续得到朋友们在人力上和经济上的帮助，我约定一个医师的助手，每小时一次地替孩子打着两种强心针……”其中包括金性尧和武桂芳对唐弢多次的经济支援。

性尧在《鲁迅风》创刊号《编后记》中写道：“本来我们是预定元旦日出版，这是应该向读者及作者致歉的。……‘蜀中无大将’，‘廖化’也终于还要‘当’一回‘先锋’吧。……我们固然爱护‘鸡零狗碎’的杂文，但却并不因此而菲薄一切‘大气磅礴’的作品。所以在此后的本刊里，……有待读者的‘源源惠赐’。什么‘派’、什么‘系’，我们全不管。唯一的要求，只是‘货真’而已”——这是性尧“奉命”担任“编辑”后根据任叔交代的“统战”精神理解后所写的“开场白”。

四、王任叔指定负责《鲁迅风》印刷发行的陈明，是党的重要干部

陈明原名陈冠球，又名陈国权。1918年出生于江苏省海门县。1933年十六岁到上海进春明书店当学徒。1935年十八岁考入生活书店，为进货科职员，业余勤读马列主义著作，1936年冬参加中

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开始后，党要胡愈之、王任叔、张宗麟、郑振铎等创办“复社”，由张宗麟任经理。党从生活书店调陈明到复社，协助经理工作，为党小组负责人。在《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的印刷、出版、发行等工作中作出贡献。1938年11月，为保护郑振铎脱险而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关押二十天由组织上营救出狱。出狱后，王任叔要他负责《鲁迅风》的印刷发行事宜。

1939年5月，地下党（上海市委）调陈明至崇明任县委书记，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文委”决定：《鲁迅风》从第十四期起改由民主人士谢旦如开设的金星书店、与地下党员楼适夷有关系的天马书店两店联合经销。陈明在异常险恶的条件下发动群众，历尽千辛万苦，开展游击战争。中共苏中区党委先后任命陈明为中共如皋县委书记、启东与海门两县中心县委书记兼县团政委。1941年12月，在与日寇反扫荡的激烈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二十四岁。后来，抗日民主政府在陈明牺牲的地方，为他建立了纪念墓地。——这是一位在《鲁迅风》开办初期作出重要贡献的无名英雄。

五、王任叔指定为《鲁迅风》发行人的来复，是进步的文化人

来复即来岚声，又名来小雍，原来在银行工作，是小报界的著名人物，1930年创办《上海繁华报》，1931年创办《世界晨报》，1932年创办《时代日报》。为人正派，有正义感，曾先后两次抵制蓝衣社特务陈宝骅插手攘夺《晨报》和《日报》。经柯灵介绍与王任叔相识，愿义务担任《鲁迅风》的发行人。并出面为《鲁迅风》向租界当局申请领取了“登记证”。在柯灵和王任叔的影响下，来小雍倾向进步，还自费办《自学》杂志，面向职业青年，请中共党员石灵编辑。抗战胜利后，《世界晨报》的登记证转让给冯亦代使用；《时代日报》的登记证转让给姜椿芳使用……

六、王任叔请孔另境为《鲁迅风》义务工作

蒋天佐说：“《鲁迅风》不能忘记孔另境同志，他对我们很亲切，帮助任叔做了不少工作，除为我们沟通了同茅盾同志的联系外，还对一批老作家有很好影响。他不是党员，但向党之心未改，这是可贵的。”（见1982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

孔另境夫人金韵琴女士回忆道：“另境活跃在《鲁迅风》周围，结识的许多文艺战友，大多是年青人，为了共同的战斗目标，团结在一起，在艰苦的‘孤岛’环境里作斗争。‘孤岛’物价高昂，稿酬低微，撰稿者的生活非常困苦。但他们给《鲁迅风》写稿，宁愿不取酬。这些朋友在抗战开始前互不往来，不容易碰到，这时被国难家愁这根无形的线缚在一起，经常会面，叙谈斗室。……当时，这一批年青的文艺战友，也常到我家聚会。我见到的有王任叔、柯灵、唐弢、石灵、文载道、周黎庵、周木斋等。王任叔给我的印象较深，他能一面打牌，一面写文章；一面又同人说话，真是才智过人。但他年龄最长，接近中年了。柯灵教师，机警灵活，是组稿能手，有名的‘高大编辑’。有一天清早，我们还未起床，他就赶来组稿了。唐弢是胖乎乎的白面书生，令人看来和蔼可亲。石灵面黄肌瘦，有病态，沉默寡言。文载道比较拘谨，宁波乡音很重。周黎庵神态豁达。周木斋老实诚恳，体态羸弱。那时我年青怕羞，不敢和他们说话，只在旁边默默地听着他们谈话，跟着他们轻轻地笑笑。他们是既严肃又活泼的一群，也常说些诙谐幽默的话逗人发笑。《鲁迅风》经费困难也是个话题。有次活泼多趣的王任叔指着《新闻报》上一条‘本市绑匪猖獗，连日作案多起！’的报道，说道：‘有了，有了，《鲁迅风》经费介决了！’大家莫名其妙，都望着他。只见王任叔指着文载道说：‘经费就在他身上。’大家更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愣着听他接着说：‘我们做一出假戏，金性尧的父亲不是个富翁吗？让性尧暂时不回家，我们写封匿名信给他父亲，要一笔钱，限期交来，不交来要撕票。’

他是长子，他父母爱子心切，一定会忍痛把钱交出来的。那经费不是就此解决了吗？只是性尧暂时受点委屈，你夫人武桂芳处我去告明，她一定会支持的。你呢，性尧，你能为《鲁迅风》立一功吗？’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连金性尧也忍俊不禁。……《鲁迅风》被迫停刊后，另境的笔也渐渐地无用武之地，没地方发表文章。他便决定把全部精力用在戏剧方面。”——（见《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第396页）

七、金性尧为《鲁迅风》的经费作出了贡献

谈到《鲁迅风》经费的困难问题，理所当然常常要靠金性尧调拨解决。对于《鲁迅风》同人中经济发生困难时，金性尧和武桂芳夫妇也“义不容辞”地经常加以援手。因为性尧的父亲是颜料化工厂的老板，桂芳的父亲是搪瓷厂、热水瓶厂的老板，夫妇俩利用家庭富裕的经济条件为文化事业、社会公益作了很多奉献。比如：唐弢的妻子王嫩长期因肺结核治疗造成经济上极端困难，除了金性尧夫妇主动上门送钱送物外，唐弢曾陆续写了十二封信向金性尧告贷……这些信，叶以群和柯灵曾寓目，唐弢向我借阅后竟全部销毁了。此外，石灵也多次向性尧告贷，解放后石灵的夫人在“作协”资料室工作，与我较熟，多次和我谈起“性尧助人急难之德”。

孔另境的长女孔海珠最近在《生死之间的重担——读父亲孔另境写于上海“孤岛”时期的日记》中写道：

“上海处于日寇包围的孤岛时期，文化人的精神生活和经济重压，这生死之间的重担使他们身心疲惫，苦不堪言。……父亲（孔另境）说：‘添此负担，不胜狼狈，幸得人助，始勉强过度。’……《日记》中他记录了至友人金性尧处告贷的情况。原因是（医院）‘调房既定，医院嘱须先付五十元，而原付之二十元则作为接生费，我囊中仅携二十元，而家中亦无存款，不得已，乃至友人金

性尧处告贷，金家距医院甚近，而又为友辈中最富足之一人，及商恳，果立贷予五十金，及返，而心中之石始坠下马。’——（孔海珠说）关于这件美事，近几年中，我曾多次向金性尧先生咨询，时隔太久，他却一点也记不得了。”（见《沉浮之间》第141页）

金性尧对待《鲁迅风》的经费和同人中的经济困难，支援的金额和次数至多且巨。但是他“助人为乐”自己从未提起。这种“施惠不要报偿”的“高尚风格”是不应忘怀的。

据我的笔记，王任叔致金性尧的信中说：既然唐弢担任“编辑”有困难，经研究，请孔另境兄参加。王任叔信中郑重其事地提出，委托性尧代表他去拜访孔另境，请他无论如何不要推却，共襄义举，一起来办好《鲁迅风》……（这封原信也被唐弢留下未还）。幸而我还保存着1938年12月24日王任叔致金性尧的亲笔信，因性尧代约孔另境上午与王任叔见面，孔另境上午“未见降临”，故写信催问……原信如下：

老孔约上午来，至今未见降临。旅冈兄^[5]稿，弟当即去索还。《鲁迅风》登记证奉上。^[6]此致

性尧兄

弟王任叔上 十二月廿四日（1938年）

八、王任叔指定为《鲁迅风》挂名编辑的冯梦云，是爱国抗日的烈士

金性尧在《〈鲁迅风〉掇忆》中说：“近几年常有人问起我这冯、来两人究竟是谁？”——有必要介绍一下：

冯梦云，浙江慈溪人。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期间，

[5] 旅冈即中共党员作家卢豫冬，又名宗珏。当时地下党派他与柯灵等一起，在编印《文汇年刊》。

[6] 王任叔通知金性尧“《鲁迅风》登记证奉上”。指租界当局批准《鲁迅风》出版而发给的“公共租界登记证C字第349号”。“登记证”写明：“发行人来小雍；编辑人冯梦云”。

是上海小报界的重要人物。与舒舍予（即老舍）友谊甚笃，爱好文学，喜欢研究国际新闻。他对小报从旬刊、周刊、三日刊到日刊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以及版面设计和内容革新等方面都作出过贡献。他的胞兄是“报关行”经理，他本人来沪后得胞兄之助，读书投稿，涉足小报界，先后创办《小日报》《大晶报》《铁报》《太阳报》《小说日报》，开始了职业报人生涯。

冯梦云少年勤学、办事干练，对报纸的编辑、广告、发行、排印、校对、设计等业务件件精通；为人急公好义，声誉鹊起；办报意识正确、立场纯正；标榜“无党无派”，人称“冯大少爷”。他在办《大晶报》的同时，又开办“大晶印刷所”，成立“大晶书局”，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小报新闻界的商业集团，成为一位小报界的著名作家和实干家。当《文汇报》开办初期，严宝礼聘请他担任《文汇报》营业主任。《文汇报》被迫停刊后，又出任抗日的《正言报》经理。

由于柯灵的介绍，王任叔与冯梦云相识，为便于向租界当局登记，冯梦云自愿担任《鲁迅风》挂名的“编辑人”。

因为有了来小雍当挂名的发行人，加上冯梦云当挂名的编辑人，租界当局立即批准、发给《鲁迅风》的“登记证”。这是王任叔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而成功的一例。

1937年“八·一三”日寇继“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又侵犯上海。冯梦云原来具有传统文人的民族气节，面临困难的关键时刻，便联络《世界晨报》的来小雍、《铁报》的毛子佩、《金刚钻报》的施济群、《正气报》的郑子褒、《东方日报》的邓萌先、《上海报》的匡孟槐、《小日报》的尤半狂、《明星日报》的胡佩之、《福尔摩斯》报的姚吉光等十家最有影响的小报，联合出版宣传抗战、痛斥日寇的《战时日报》，由冯梦云和龚之方任主编。国军西撤后被迫停刊，虽然为期不足三个月，但在《战时日报》上不仅发表抗日救国的文章，还大量宣传共产党是挽救民族危亡的中